

话语分析、后价值论、后知识论

——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解构批评的三个主题及其意义

王文博,汪正龙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是美国重要的解构批评家,其思想涵盖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文学的话语分析、后价值论和后知识论。文学的话语分析反驳了传统的形式语言学路径,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后价值论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永恒性、绝对性等传统价值论,阐明了价值的或然性;后知识论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倡导相对主义的知识论与真理观。史密斯代表了解构批评的经验主义路径,值得我们研究与重视。

关键词: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解构批评;话语分析;或然性;相对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21)05-0051-09

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193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她既是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模仿论、价值相对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也被公认为是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美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与影响,但是国内对其系统研究尚有不足。综观史密斯的学术演变历程,话语分析、价值的或然性、知识的建构性是其从事解构批评的主要领域和基本问题。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考察,并给予评判。

一、文学的话语分析

史密斯开辟的文学虚构话语分析主要是对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把文学研究的对象放在文学的“物质事实”^①即语言形式上,致力于对文学语言、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进行区分。史密斯认为文学不能从语言的形式属性去定位,而应着眼于其功能,联系话语的复杂语境状况,在尽可能多的要素中去分析,即把语言作为行为和事件,在一定的语境和习俗规约之内探讨语言双方的交互关系。相对于此前的语言分析,话语分析加入了说者、听者、语境、惯例等等因素,是一种交互系统的考察,更能够说明文学的性质。

史密斯的“虚构话语理论”萌发于与古德曼的论争。古德曼在《艺术的语言》中分析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发现文学艺术没有束缚于现实事物,没有其确定的依据与稳定的来源,进而批驳了传统的模仿理论、再现理论等等,走向了符号形式本体论。艺术形式是符号的建构,这种符号结构在各自的系统中是完全封闭和自足的,不能、不会也不该指向外在世界,“在文学中,作品是字符本身”^②。虽然史密斯也反对传统的模仿理论、再现理论,但是她认为古德曼从符号本身的形式特性去界定何种符号为文学的方法显

①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②纳尔逊·古德曼《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收稿日期:2020-01-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转向及其意义研究”(17YJC752016)

作者简介:王文博(1992-),男,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汪正龙(1965-),男,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然是失败的,因为符号本体并不能区分何种符号为文学而何种不是,“古德曼好像想让我们把文学理解为不加区别意义上写下来的东西,而这在对各种艺术进行考察的背景中是令人惊讶的”^①。史密斯并没有走向符号本体论,而是将符号分析包容于话语分析之中,走向了“虚构话语理论”。

史密斯区分了两种话语:自然话语和虚构话语。自然话语指“所有那些可以被看作是某人在某时某地正在说某件事的话语,是那些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特定场合中对于特定的场景作出特定反映的言语行为的话语”^②。通过这一定义,史密斯想要说明,自然话语是发生于历史中的确定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史密斯进而强调了自然话语这一概念蕴含的所有特殊性,“一个自然话语是一个历史事件:像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它在时空中占据了一个特定和独一无二的点”^③。强调自然话语作为历史事件是为了与其他一些特定的语言结构作出基础性区分,那些语言结构可以独立于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而被定义和描述,比如字典词条。字典词条中的词汇或者词组本身不是特定事件,它们是语言形式。形式语言学就是从语言形式出发,只注重了说出的语言文本,丢失了主体交往维度、语境维度以及交往之所以可能的共享的文化符码维度。这三个维度被史密斯统称为自然话语发生的“语境”或“总体状况”(the total set of condition)。语境不仅应该理解为一个自然话语发生的静态情境和时空容器,也应该从发生和建构的角度,将语境理解为一个自然话语发生的原因。“最好不要简单认为一个话语的语境是它的外部机械设定,更应该视为一个总体的状况条件”^④。总体状况决定了一个话语的发生和形式,使我们在特定的时间点说一些话,并且塑造了我们话语的语言结构,同时也决定了一个语言结构应该如何被理解。史密斯的话语分析尤其注重了语境维度,而一个话语的语境因素是多重的、可变的、甚至是无穷的。史密斯对于话语的语境因素进行了无穷扩大,其话语分析要容括和发掘尽可能多的变量因素,这也是其解构思想的一个来源。

虚构话语指没有发生在历史中发生的非事件性话语,完全是由语言结构组成,而自然话语是由发生在历史语境中的语言事件组成。史密斯认为,虚构话语典型地说明了文学作品的性质,“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自然话语的重绘或再现而不是实例”^⑤。文学本质上是虚构话语,不是历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话语行为或事件,甚至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说发生过。“在舞台上表演的行为和事件不是正在发生,而是要被表现得好像正在发生”^⑥。当我们在看《哈姆雷特》时,并没有看到一个女王在喝毒药,而是设定了那样一个事件,所谓的发生只能在那个设定中。同样,《哈姆雷特》再现了一个人杀死弑父凶手,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例,在舞台上并没有一个人真正杀死了另一个人。诗歌作为虚构话语最重要的不是说话者、编制的读者、表达的情绪、暗指的事件是虚构的,而是说话、编制、表达、暗指本身是虚构话语行为。小说的虚构性并不在于指涉的人物、物体和事件是否真实,而是指涉本身的不真实。在小说中,报告事件、描述人物、指涉地点的行为是虚构的,小说再现了一个人报告、描述、说明的话语行为。史密斯将文学定义为虚构话语,认为虚构话语是对自然话语的模仿或再现,由此在传统模仿论崩解之后提出了新的文学模仿论。这种模仿是话语模仿,是全局性质的模仿。传统模仿论认为文学再现人物的形象、观念、感情或者虚拟的事件与世界,而史密斯认为文学以语言媒介所再现的是语言,更准确地说是话语。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可以分辨出再现了一定的话语类型。抒情诗是对于私人话语的图绘,“而小说明显是后古登堡时代的文学体裁,典型地再现了那些编年史、杂志、书信、传记和回忆录”^⑦。应该注意的是,艺术作品的模仿或再现并不是对现存物体和事件的模仿和再生产,而是虚拟物体和事件的建造,“我们可以不把艺术作品看作在不同媒介下的模仿,对已存在于自然世界的特定物体和事件的模仿,而应看作是对于自然物体和事件的一个虚拟种类的创造”^⑧。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4.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15.

③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15.

④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16.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8.

⑥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24.

⑦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8.

⑧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27.

但是,史密斯又认为虚构话语与自然话语没有根本的区别,二者会在特定语境中因其发挥的功能而产生越界,区分的标准在于话语接受的传统与惯例。当女儿对父亲说,我是一个邪恶的女巫,我要将你关进地牢,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需要将其作为虚构话语。而当引用一句情诗说给情人时,这句情诗作为自然话语在起作用。自然话语处在语言市场中,听者和说者被其交易功能所制约和逼迫,其中充斥着现实利益、道德伦理、文化礼节的规约。“人们总是富有言说的冲动,而总有一些想要表达的情感、展示的知识、说话的方式,没有言说的机会、合适的听众或可行的风格。虚构话语的接受传统与惯例设定正是帮助我们定义了那些场合、设定了那些听众、制造或发现必要的风格”^①。统摄虚构话语的功能、传统和认知惯例与自然话语不同,在其中,读者和作者进入了一种特殊关系,完全不同于自然话语中对于听者、说者所要求的责任。“功能和传统是关于文学区别性特征的任何讨论所不可缺少的”^②。文学脱离语言市场,从其中的束缚和控制中解放出来,被接受为虚构话语,由此释放了其美学功能。史密斯认为,相比于自然话语,虚构话语更能为人们提供认知的乐趣,对它的阐释是一种奖励性行为,也可以更好地突出语言结构自身的特性和形式。

自然话语不能脱离语境而被独立辨认和描述,它的含义也不能独立于语境来理解。“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话语的‘含义’指的就是它的语境,引起它的发生并决定它的形式的一整套状况条件”^③。自然话语的发生语境是历史确定性的,因此其意义也是历史确定性的,文学完全由语言结构组成,没有一个其所发生的确定语境。文学语言中的任何事物,出现的“树”、“海”、“人”等都不具有历史确定性,都不能在历史时空中找到确定的对应物。“尽管一首诗是一个没有特定历史语境的虚构话语,它的典型效果是创造一个语境或者准确地说是邀请和使得读者为它创造一个合理语境,当我们说理解一首诗时,大体是讲一个推断猜想的过程,实际是创置一个语境”^④。因此,虚构话语扩展了语言的阐释空间:它不同于自然话语反映了一个意义在其中定位的语境,而是创造了一个意义在其中定位的语境,因此文学语言比自然语言更加丰富、更具暗示性,它要求读者参与意义的创造。语言结构激起读者的联想和推断,读者调动和依据自己已有的历史经验,为这些语言结构创制一些对应物,创制一个话语发生的合理语境。而这种推断和建造不具有历史确定性,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通向了解释的无限性。“诗歌的语言将持续有意义,只要我们有意义提供给它。它意义被耗尽的界限只在于读者自己的经验和想象的界限”^⑤。文学自身的生命活力也来自于读者可以不断地投入经验和建构阐释的无限性。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如同游戏中的双方,当两者势均力敌时,作品能够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读者能够得到最好的艺术体验。当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者相遇时,这场阐释游戏才是最迷人的。文学阐释在理论上具有无限性,而阐释的限度不在于作者意图的维度而在于读者维度,在于阐释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维度。

二、价值的或然性

在对文学的性质与阐释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史密斯便关注到评价与价值问题。史密斯反驳了传统价值论过于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永恒性、普遍性、确定性的说法,提出了价值的或然性理论和在此基础上的后文学价值论。

传统价值论以休谟、康德为代表,张扬价值标准的客观有效性。休谟在《论趣味的标准》中论证客观的趣味标准的存在,并认为寻求趣味的标准是人类的天然冲动。史密斯质疑了客观的趣味标准的合法性。她认为,正如测量工具和测量标准具有其自身的权威范围及其建立的武断性,趣味标准的建立本身也是武断的,并且不是服务于普遍利益或社区的共同目标,而是一些人的评价权威压制了另一些人的。“休谟价值论逻辑的核心动作是把趣味的标准归结为所有人共有的精神生理本质。这个论述的核心是,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110.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82.

③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21.

④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33.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 The Relation of Literature to Language* p.37.

通过我们的内在生理结构、器官、机制,一些形式特性自然地产生出愉悦或非愉悦的感情,同时,这些感情是所有有艺术普遍准则的来源和趣味标准的经验基础”^①。但是,这个趣味标准总是面对着一一些例外情况,人们的生理器官总是会出现毛病,人们的审美感受总是出现差异。由此,趣味标准的有效性范围总是面临限制,普遍性原则总是需要在许多有利条件的结合之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如休谟所说,“我们若要作这方面的实验,借以鉴定任何美或丑,一定先要择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使想象处于一种适当的环境和状态,心情要平静,思想要集中,注意观察对象”^②。休谟论证存在客观的趣味标准,其论证逻辑中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充的现象,使得客观标准愈加虚弱并回到了趣味具有多样性的起点。

同样,史密斯也不赞成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鉴赏判断的普遍性、必然性,“假设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认知机制,如果一个人对于客体的判断仅仅反映那个机制的运作,没有被其他个人精神活动或者感官感觉所污染,也没有被情境性的或然因素所污染,那么这个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与其他人的相同”^③。首先,康德的论证逻辑中假设了人所共有的统一的认知机制,而这一假设是否有根据有待康德去分析论证。其次,康德的价值论逻辑要求排除一切个人的、情境的污染,达到绝对的纯粹性,这样鉴赏判断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康德认为鉴赏判断是审美无利害的,既不能“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④,也不能通过理性联系着概念来认识。它们既不是感官的愉悦,也不能是善的愉悦,既独立于主体的私人感觉,也独立于客体的意义和目的,鉴赏判断必须是纯粹的。史密斯则认为,我们对于任何事物的体验,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康德所要求的纯粹性。康德的论证逻辑所假设的趣味客观判断的纯粹性远离了真实世界的状况,除了对于纯粹性的需要产生了一个不断划分界限和不断提纯的过程,还预设了一个普遍的认知机制,“仅仅在这个预设之下,可以说趣味的判断是有根据的”^⑤。而康德对于普遍认知机制必然性的证明又是根据知识必然性的普遍认可,而知识的必然的普遍认可同样面临着怀疑主义的威胁,其自身的根据也是可疑的。最终,康德只得求助于另一个替代性方案:鉴赏判断普遍赞同的必然性作为一种主观必然性在某种共通感的前提之下被表象为客观的,“共通感这一不确定的基准实际上是被我们预设了的:至于事实上是否有这样一个作为经验可能性之构成性原则的共通感,还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性原则使它对人们而言只是一个调节性原则,即为了更高的目的才在我们心中产生出一个共通感来”^⑥。可见,康德对于鉴赏判断普遍性、必然性的证明出现了循环论证,需要不断地引入更高层级的目标或理想规则,由此,证明工作滑入了无限倒退。史密斯认为,“声称鉴赏判断有普遍有效性看来并没有最终的根据,最后仅剩的是声称本身”^⑦。

传统价值论将评价话语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偏好和客观判断,区分了两种价值——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评价话语的两种基础类型中,一种被认为仅仅表达了主观的个人偏好,比如这样的陈述:“我喜欢它”、“我想做它”、“我这样认为”;另一种被认为建构了对某物客观价值的判断,比如这样的陈述:“它是漂亮的”、“它是正确的”、“它是真的”。如今此一区分有了当代形态,例如麦金太尔的《美德之后》。麦金太尔将道德话语和道德实践的没落直接与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相联系,“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表达的意义和用法变得在不同的人那里极端的不同。……我们不能在听一个人表达道德判断的时候,仅仅通过听他所说安全地推断他在做什么,他可能通过呼吁客观标准,而事实上在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情绪”^⑧。麦金太尔认为,我们无法从一个人的言语陈述中判断他是在表达个人偏好还是客观价值,这引起了语言的意义和用法的混乱,并导致了道德的衰微和没落。史密斯并不认可麦金太尔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言语形式中,所有东西都存在于语言主体自身,尤其是存在于他们产生言语形式的倾向中,即在特定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9.

②休谟《论趣味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卷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831页。

③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67.

④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70.

⑥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6页。

⑦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71.

⑧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14.

环境状况下以特定方式产生的回应”^①。不能仅从语言形式中去推断意义,必须联系于它所发生的语境。而语境是千变万化的,同样的话语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可以表达个人偏好,也可以表达普遍诉求或客观价值。由此,史密斯作出了两个推论:关于某个实体价值的言语判断不能是一个独立的确定的判断,不能是实体的客观属性;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拥有通常意义上的真理价值^②。史密斯认为,主观偏好和客观判断的区分没有最终根据,价值判断中没有客观事实,也就没有真理价值,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之间同样没有难以逾越的界限。

先前对人文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区分与对立,导致了美学话语与经济话语的区分与对立。因为功利价值指的是物质的获得和个人的福利,人文价值指的是精神的充盈和集体的福利,并且被认为可以通过付出功利价值而获得,这就把价值的神圣领域与世俗领域对立起来了。这种价值的二元主义划分形成的价值双重话语,把事物的价值二分为工具价值(或实用价值)及其内在价值。鉴于内在价值同时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这种划分缺乏根据。很显然,当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打破了使人愉悦的东西和使人满足的东西之间的边界,价值的双重话语已经失效了。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经济分析表明,文化价值也需要满足一些要求与欲望^③。史密斯将所有的价值都归结为实用性。两种价值话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其计算方式是相对的、互补的,但没有本质区别,两者在根本上都是成本收益计算。

正如巴塔耶在《耗费的观念》中所认为的,所有的讨论都取决于“有用的”这一词的基本价值^④。经典实用主义理论赋予物质材料的获得、生产和保存以及生命的再生产和保存以特权,而巴塔耶明确反对关于人类行为的任何合理原则或者经济原则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对于“非生产性耗费”和“绝对缺失”(absolute loss)“有着基本需求。”“现在,有必要将耗费一词的用法保留着来表明这些非生产性形式,而不用它表示为了生产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模式。……其特征是,它们的重点都置放在缺失(loss)上,这个缺失应当是彻头彻尾的,这样,这个活动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⑤。首先,耗费意味着绝对缺失,这是一个没有补偿和报答的损失,因此不能成为任何收获的工具。巴塔耶的耗费是对实用主义的经济原则的彻底反对,其耗费观念是对于经济原则或合理原则的反对本身,不能有任何目的和欲望,否则将落入目的论原则或者功利原则。史密斯对于巴塔耶的耗费与缺失的解构,就在于看到了不存在绝对的耗费和绝对的缺失,因为总是得到了什么,其中同样有着成本利益的计算在里面。正如巴塔耶对于夸富宴(potlatch)中耗费的论述,“仅仅通过缺失,辉煌和荣誉才和财富相连”^⑥。其次,缺失不可避免地要跌入目的论逻辑,也即重新跌入工具主义和经济主义逻辑,因为不存在绝对的缺失,缺失总是换取了什么,总是具有其目的论指向,即使缺失本身成为目的。“缺失成为了欲望的最终客体,最高级的利益。尽管文章(指巴塔耶《耗费的观念》——引者注)随后似乎把缺失也看作是次级目的,因此相对于最终和更高的目的成为手段。算法还是那个算法,一个利益替代另一个利益(good),或者一种获取交换为了另一种获取”^⑦。

史密斯最终将价值表述为一种系统动力学的产物,并且是一种经济系统。“一切价值从根本上说都是或然的,既非客体的固有属性,亦不等于主体的任意估计,而是一种经济系统的动力学产物”^⑧。“就如市场价格那样,某个实体对于具体主体的价值,也是一种经济系统,特别是由主体的需要、利益及资源——生物的、心理的、物质的、经验的——构成的个体经济动力学的产物”^⑨。

在论证价值或然性、变易性、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史密斯提出了她的后文学价值论。“一切事情相关于另外一切事情,都在变化中。如果存在文学价值的永恒性,它们将会在那些变化中发现:就是在变量的关系中”^⑩。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89.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94.

③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判断》上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49页。

④乔治·巴塔耶《耗费的观念》,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⑤乔治·巴塔耶《耗费的观念》,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第27页。

⑥乔治·巴塔耶《耗费的观念》,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第33页。

⑦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139.

⑧B.H.史密斯《价值的或然性》,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4页。

⑨B.H.史密斯《价值的或然性》,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115页。

⑩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15.

她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评价变化为例证,给出了两种强烈变化的价值光谱:历史层面和个人层面。在历史层面,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评价历史,其中充满了妥协和变易。“我们可以回忆,十四行诗曾经被有知识和鉴别力的人评价为笨拙的、模糊的、做作的,充满了‘用力的混乱、学究的畸形’,被写成一个‘不符合英语语言’的韵文形式,一个‘形式文字失调、僵化诧异的’胡言乱语。我们尤其可以回忆亨瑞·哈勒姆对于十四行诗的评价,‘不可能不希望莎士比亚没有写过它们’。他的论断和悲伤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共有的,包括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黑兹利特”^①。而在史密斯体验十四行诗的个人层面,它们的价值更是激烈变化和充满偶然。“没有一首十四行诗没有在某一个时间为我提供了一个最出色的最强烈的文学体验。它们之中也不只一首曾经在某个时间让我强烈感受到厌恶、牵强、愚蠢、呆滞或者死寂”^②。通过对于十四行诗在个人与历史两个层面的价值变化的描述,史密斯想要说明,评价总是妥协的,价值总是在运动中,评价与价值是不断变化、永远不确定的。

文学价值的变易性来源于价值评断背后的无穷变量因素。当我们对一个文学作品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时,我们的评价行为隐含了多重因素,包括“评估作品何种程度上发挥了某些特定功能,这些特定功能是面向哪些特定读者群体的,这些读者是在何种条件和情境体验作品的”^③。有些变量因素是隐秘的、没有指明的,但价值评断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情境中,我们总是通过一个真实但有限的透视点去体验作品,我们的价值体验是真实的,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个价值的限定性和变易性。后文学价值论旨在立足于引起价值变化的无穷变量,来重建文学价值论。这是后现代文学价值论建构值得重视的尝试,所以有学者认为,“把‘后文学价值论’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芭芭拉·史密斯”^④。

三、知识的建构性

与其价值相对主义主张相关联,史密斯解构了价值的真理,并由此走向了解构绝对的“真理”本身,提出“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拥有通常意义上的真理价值”^⑤,从而走向了建构性的真理观与知识论。她把矛头首先对准科学和知识领域的真理观,因为科学与知识向来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代表,也是真理观念的根据与来源。

史密斯认为,知识的基础问题是哲学的耻辱。“康德把始终还没有人为‘我们之外的物的此在’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足以扫除一切怀疑的证明这件事称为‘哲学和一般人类理性的耻辱’”^⑥。“这个问题是哲学没有能力表明:我们怎样确保,何时能够确保,为什么可以确保,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或我们知道任何东西”^⑦。认识论或知识论问题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笛卡尔怀疑了世界的真实性,并最终循环论证的方式以上帝的完善性确保了世界的真实性。康德批判哲学的目标就是要为知识奠定根基。这一哲学目标延续到了黑格尔哲学没落之后的新康德主义,李普曼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即是要重新发现哲学的崇高事业:解释科学的最终根据,为知识奠定根基。胡塞尔提出“回到事情本身”,重新思考知识的基础问题。“‘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既往哲学的认识论或既往哲学的真理观无法解决知识的真理问题。而在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中,知识的耻辱问题或知识的确定性问题也是没有能够解决的。怀疑主义加剧了知识的耻辱问题,“怀疑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壁橱中的隐情”^⑨。西方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和真理观面对着怀疑主义的抵抗。在其中,知识和真理要区别于意见、迷信、幻想、愿望、错觉和幻觉。知识必须是对于实体正确的精神再现,实体必须是其本身所是的东西,独立于人的认知、感觉和描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4.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6.

③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13.

④刘峰《“后文学价值论”——芭芭拉·史密斯和她的〈价值的或然性〉》,《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3期。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p.94.

⑥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4页。

⑦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

⑧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236页。

⑨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13.

述。而怀疑主义认为,“我们无法确保我们知道任何事情——至少在我们将知识看作是对于实体正确地精神再现的意义上,在我们将实体作为是其本身所是并且独立于主体认知、感觉和描述的意义”^①。

史密斯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三种方案,“最通常的做法是忽略它”^②。这是大多数人所采取的做法,它无疑是回避问题的鸵鸟政策。另外一种做法是将怀疑主义攻击为自我矛盾、自我悖反的,怀疑主义对真理的怀疑否定了该怀疑本身。史密斯认为,这种反驳依从的是绝对真理观的逻辑,是在绝对真理观概念系统内部的自我保护、自我赋权和虚弱重申,无视了怀疑主义所具有的合理性。

她认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建构主义,即重新定义知识和真理的概念。“传统认识论无疑是一个哲学追求,以确定性的规范标准为目的,以逻辑分析为方法”^③。而路德维克·弗莱克、托马斯·库恩、迈克尔·福柯、大卫·布鲁尔、布鲁诺·拉图尔等人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和科学社会学研究明显不属于传统哲学事业。他们更多地把知识和科学看作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尽管包括了概念探索和重构,但更多是经验性的。“通过质疑知识的传统概念和把科学看作是一系列的历史现象和社会文化实践,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后库恩时代的科学研究完全不同于笛卡尔、康德传统下的哲学认识论和维也纳学派、卡尔·波普尔传统下的主流科学哲学”^④。

史密斯所谓的建构主义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建构主义认识论以及建构主义的科学历史学和科学社会学。“在当代的大多数用法中,建构主义这一术语主要用来表明一种特殊的理解方式,用以理解我们所谓的知识和我们所经验的实在之间的关系”^⑤。不同于实在主义的理解方式,建构主义认为我们所经验到的真理、科学,我们所想、所说的世界,并不是先验的,独立于我们的感觉、认知、动机、概念话语活动,相反是在其中产生,被这些活动建构。不同于意识哲学的理性主义先验预设,建构主义的认知观点并不把信仰看作是对世界独立的、正确与否的命题再现或精神再现,而是看作我们在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用中所不断加强、弱化或重组的认知倾向和行为惯例。不同于语言的指称主义观点,建构主义并不把真理看作是陈述、信仰与外部世界的确定特征的对应,而是看作陈述、信仰与经验、实践活动的相对稳定地有效地互相协作的过程。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建构主义并不把科学真理和知识看作是理性的科学探索方法的内在对称的产物,而是看作认知的、概念的、行为的实践在文化、经济、政治的广泛领域中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产物。

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了知识的本质和人类认知的运作。不同于理性主义的知识概念,建构主义并不将知识对立信念,而是将其看作相对完善地建立的信念。“知识或信念可以看作是三种力量不断交互作用的产物:个人的行为认知活动和经验;普遍的认知过程;特殊的思想和实践的社会团体系统”^⑥。由此,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理性与利益、情感之间的对立被替代为所有信念都是被或然性地塑造,被多重因素限制。科学知识与个人意见或普遍迷信的对立被替代为所有信念都联结于其他相对稳定或完善建立的信念。建构主义知识论并不是要否定或打倒传统认识论中作出的这些区分,建构主义并不会因为非理性主义而抛弃理性,不会将科学知识等同于神话或意识形态,而是要将其接受为多重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极端对立的。建构主义知识论与传统认识论之间关于知识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史密斯对此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表格^⑦(详见表1)。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两套理解知识和科学的概念系统,传统知识论和建构主义知识论在其概念系统内是各自完善的,也就导致两者之间的争论往往被误解,出现争论的僵局。“他们根本听不见你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只是在重复同样的观点”^⑧。建构主义否定了传统知识论中的绝对主义、客观主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1.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2.

③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3.

④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3.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3.

⑥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11.

⑦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12.

⑧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Belief and Resistance: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Controvers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i.

义、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没有本质、基础和真理。而建构主义因此被认为存在述行矛盾:既然没有绝对真理,那么对绝对真理否定的本身也没有真理。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对于怀疑主义的第二种处理方法。这显现了传统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沟通的失败和理解的无能,而其本质是不能跳脱自我的概念框架去思考建构主义对于绝对真理的否定。“因为他很难认识到其思考逻辑是有问题的”^①。建构主义否定了传统真理观,并对于真理提出另一种理解方式,这时的真理已经不是“真理”,或者说已经不是传统真理观或传统理解方式中的真理,这时的真理失去了其真理性,成为相对真理,并不具有绝对性、超越性、永恒性、本质性和基础性。

(表 1)

20 世纪知识和科学的再概念化

传统实在主义、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概念	区别性的建构主义、实用主义、交互主义概念
个人的	公共的、社会的、制度的
内在的、智力的、精神的	表现的、具身的、制定的
命题、法则、模式	活动、技巧、实践
再现、一致	交互作用、协作
发现	建构
理性、逻辑、实验	协商、修辞、运作
统一、发展	多样性、转换
真理	效率
自主	联结、交互
客观	利益
永恒的、普遍的	历史的、语境的

传统主义者将建构主义理解为相对主义,并对相对主义进行污名化,认为相对主义对于绝对真理、客观本质、普遍基础的否定必然在伦理与政治领域产生这样一些显然不可通行的命题,比如任何事情都是同样有根据的平等主义、不做任何事情的无为主义、不做任何裁决的沉默主义等等。而这些传统主义者所认为的结果显然是不成立的。建构主义否定了绝对真理,但并不否认相对真理,而且建构主义的相对主义可以更好地处理伦理与政治事务,不会是沉默的、无为的、平等的。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同样认可了相对主义对于绝对主义的否定:“如果说这个立场就是相对主义,则我看不出相对主义在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中丧失了什么。”^②保罗·法伊尔阿本德是建构主义者中观点最为激进的,尽管他声称“怎么都行”,但是“怎么都行”并不是传统主义者所认为的不合理的相对主义,而是有其一定的陈述语境。“由于把我们的判定建立在业已接受的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对这种研究只能说:怎么都行。注意该陈述的语境。‘怎么都行’不是我推荐的一种新方法论的唯一‘原则’。它是那些坚定地信奉普遍标准、希望根据普遍标准理解历史的人唯一可用的方式”^③。托马斯·库恩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对于相对主义的理解明显不同于传统绝对主义者对于相对主义污名化的理解。“‘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概括了人类没有能力容忍世间人事固有的相对性”^④。相对主义否定了绝对主义所宣称的最终真理、根据、本质,但并不否认有相对的真理、根据和本质。相对主义同时不会是一种新的绝对主义,即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处于一种拥抱性质的永恒对抗之中,但并不能成为新的绝对真理与教条。“相对主义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一个单线程的直接的命题或观点”^⑤。需要区分相对主义的日常理解和污名化理解,在严肃思考和论证中重新赋予其丰富内涵。

史密斯解构传统真理观和知识论中最为激进的动作是否定传统真理观中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与区分。在其《自然映像:科学与宗教连结处的人类认知》中,她评估了当代科学、信仰与人类认知相关的论题,并将其总结为两个工程。其中之一是新自然主义,它主要是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努力在认知科学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Belief and Resistance: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Controversy* p.89.

②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③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④理查德·罗蒂《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

⑤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Scandalous Knowledge: Science, Truth and the Human* p.18.

和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上去解释信仰。另外一个被她称为新自然神学,它是由一些科学知识渊博的神学家努力去调解自然科学与传统的宗教信仰。这两个工程,一个是将宗教自然化,一个是将自然科学神学化。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与对比关键在于最终根据和最终真理的问题。用自然科学去解释宗教信仰容易理解,但是自然科学的最终根据问题没有得到追问。而科学在失去其真理根据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对立。与此同时,新自然神学可以轻易地把科学规律看作是上帝的安排,例如进化是上帝一手安排的,基因对于生物的作用正是来源于上帝的万能和巧夺天工的智慧。史密斯认为,“没有任何本质上或逻辑上的东西能阻止给科学发现和科学概念作神学注释,进行神学的解读。但是,同样也没有任何本质上或逻辑上的东西能阻止别人接受科学发现和科学概念”^①。科学与宗教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但这并不是否定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区别,同时也不能否定科学比之于宗教的认识论权威,但需要明确,这种差别和权威只是相对的。“我们赋予科学这种文化形式具有认识论权威的原因不在于其理论具有超验性的真理,而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对环境进行预测和回应。这样的观点并没有破坏科学的权威,而是解释了那些权威的来源和运作”^②。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与区分在没有根本根据之后,两者都成为一种信念和信仰。史密斯把科学与宗教看作是个人认知过程中的自然反应,认为两者都是在个人认知过程中所形成和建构的信念与信仰。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去理解和分析科学与宗教在个人认知中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的复杂因素、状况。

结语: 解构之后的建构路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从文学的话语分析,到后价值论和后知识论,既体现了史密斯思想发展的演变轨迹和基本主题,也体现了她试图把文学、伦理与哲思进行关联与统一的学术抱负与旨趣。

文学的话语分析奠定了史密斯解构批评的方法和路径:在多重因素的复杂交互系统中分析事物,反对二分法和一元论。话语分析方法能够发掘尽可能多的异质经验事实,并进而以边界案例否定或解构既有的理论框架。对于传统价值论的解构,史密斯发掘了价值在个人接受和历史接受中的多样性及变易性事实,承认了价值的或然性。价值既不是主体的普遍本质也不是实体的客观属性,而必须联系于具体语境,在其中,价值是无穷变量因素的一个经济动力学产物。知识与科学同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维度,并没有最终的真理根据。真理是被多重因素建构的相对稳定的信念,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来自于话语分析以来对于多重因素复杂性、变易性的强调。质言之,史密斯的解构批评是一种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其具体的解构路径是经验路径,方法是还原主义,立足于不可通约的经验事实。不可通约的经验事实指的是一个总体性框架总会有其模糊的边界,总会有突破其框架的边缘案例,通过其无法涵盖、不能通约的边界案例可以解构以往的绝对的总体性框架。

从整体上来看,解构批评有两种路径:以德里达、德曼等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路径和以史密斯、罗蒂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路径。前者在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拆解之后,否定了理性的地位与作用,破坏性大于建构性;后者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世界,在解构了以往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之后仍然有重建的可能,其重构的比重要大于解构。而史密斯、罗蒂、德里达等人对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反驳,解构了知识、客观、理性等,促成了后真理时代的到来。只有在“绝对真理”跌落的后真理时代,才会出现人文科学领域的伦理转向、文学转向和修辞学复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密斯的解构批评与理论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贡献与地位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熊显长]

^①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Natural Reflections: Human Cognition at the Nexu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3.

^②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Natural Reflections: Human Cognition at the Nexu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p.116.